

逢星期日出版

稿 例

本版園地公開，歡迎惠稿。舉凡短篇小說、散文、詩歌、文學翻譯、作家評論、文壇動態述評，均所歡迎。因篇幅關係，文長請勿超過五千字，詩（每首）以五十行之內為宜。稿件一經刊出，即酌致薄酬。

翻譯與生命的融合

——懷念楊憲益先生

□李景端

楊憲益先生高齡仙遊，我在無限傷感之餘，湧上心頭更多的是，懷念他一生卓越的貢獻，崇敬他坦蕩正直的為人品格。楊老走了，他留下的豐富精神遺產，必將長久地激勵着後人不斷前進。

我是從事翻譯出版的，對楊老在翻譯領域的貢獻感受尤深。楊憲益及其夫人戴乃迭，畢生把生命獻給翻譯，在逆境中堅持搞翻譯，在翻譯中書寫自己的人生，可謂把翻譯融入到生命中去了。我認為，楊憲益對我國翻譯事業的貢獻，至少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樹立了高尚譯德的楷模。楊老為人向來低調，少見他發表什麼「閃光」的語言，但他卻以自己從事翻譯工作的實踐，表現出一位學術與修養兼優的翻譯大師的高尚風範。儘管他自稱，一九四〇年從英國回到重慶時，一不會做官，二不會做生意，是被梁實秋「陰差陽錯」拉進了翻譯圈，但一挑起翻譯這個擔子，他就注入了極端的責任心，長年轉換兩種文字，毫不懈怠。他說過，忠實是翻譯的第一要義，譯者既不能誇張，也不能夾帶別的任何東西，譯者過分強調創造性是不對的，因為這樣一來，就不是翻譯，而是改寫了。反觀時下譯壇，譯者隨意加油添醋，什麼編譯、摘譯，還有更另類的，根據別人的譯文來個「譯寫」，這些豈不正是楊老所批評的「改寫」嗎？

楊憲益辦事一向認真，對翻譯質量更是一絲不苟。他的許多譯作，都是字句推敲，精益求精。唯有一次大躍進年代，他奉命趕譯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只花了十天就譯出交稿，因對其質量不滿意，楊老一直為之感到遺憾，並時常以此相告誡。這就是一種負責任的譯德。也正是當今譯界需要大力倡導和弘揚的社會美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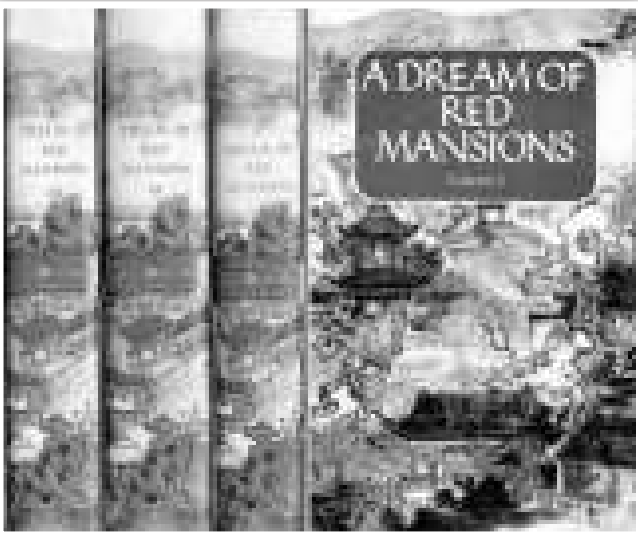
其次，創造了「楊憲益翻譯模式」。翻譯雖是單人精神勞動，但因涉及兩種文字的轉換，一個人在應用非母語中，總難免會有些語言和文化解讀上的局限。楊憲益與戴乃迭這一對翻譯搭檔，運用各自母語的優勢，取彼之長，補己之短，創造出兩人譯校互補的翻譯模式——「楊憲益翻譯模式」，這在中譯外當中，確實收到了相得益彰的較理想效果。尤其是楊老所譯的多是像《離騷》、《詩經》這一類蘊含很多特定含義的中國古典文化作品，缺乏較深古文根基的人往往領會不準確。同樣，對英美的語言文化不熟諳的人，在轉換成英文時也很難實現本地化，這個距離也是長期困擾譯界的一個難題。人們當然不能期望面向外國讀者的譯作，全部由中外夫妻搭檔來完成，但從「楊憲益翻譯模式」中至少給人

一個啓示，中譯外最好能有兩位精通各自母語的譯者來合作。當前我國國力日益增強，翻譯是增強我國文化軟實力的必不可少的手段，往後會有很多中國文化要「走出去」。我希望，進入跨文化時代，譯界會參照上述精神，克服「中國式英語」的弊端，研究和發展更優質可行的「楊憲益翻譯模式」。

再有，留下了豐碩的翻譯成果。楊憲益精通多種外文，對古漢語也很有研究，訓詁、考證、寫古體詩，樣樣都會，可謂博古通今。但他最大的學術成就，無疑還是翻譯。從四十年代起，他們夫婦就翻譯了《離騷》、《楚辭》、《史記選》、《唐代傳奇選》、《關漢卿雜劇》、《紅樓夢》等英譯本四十多種，《奧德修紀》、《賣花女》、《羅蘭之歌》等中譯本十餘種，其中楊戴合譯的《紅樓夢》等多種譯作，因詮釋到位，質量上乘，迄今尚無其他譯本可以企及，被譯界許多人譽為可資傳世的佳譯。楊憲益的翻譯成果還有一個明顯特點，那就是他的衆多譯作，都只限於中外文學，從未見他公開出版過其他領域的譯作。不譯自己不熟悉的東西，這正是負責的翻譯家，對待翻譯態度嚴肅的一種表現。而現在有些譯者，只要高稿酬，以為憑藉詞典在手，文學、社科、科技，什麼書都敢譯，以致其譯文出現外行話或專業常識錯誤，自然就不足怪了。僅此一點，楊憲益又給後人做出了表率。



楊憲益



秋 葉

□一默

當金黃的秋葉隨風飛舞着飄落，感傷的詩人為它唱起了哀婉的戰歌。
秋葉也感到了死的悲哀麼？
隨風飄飛，且舞着，圍着生它養它的樹，終於精疲力竭，落於它的生命之本——大地上，落於它的根的周圍。

風來了，吹它到極遠極遠的地方：路邊，田頭；陸上，水中……
雨來了，淋濕它，腐爛它，粉碎它……
太陽來了，曬乾它，成為粉末……
風又來吹它，雨又來淋它，太陽又來

曬它……終於成了黑色的泥土，融於黑色的大地中，匍匐於大樹的身下。於是，樹又汲取它；於是，樹又伸出嫩芽，發出新葉……
秋葉，它又獲得了新生麼？
秋葉，它也感到了再生的快樂麼？

飢餓的年代

（英）伊·范斯坦 俞士忱譯



楚科夫斯基一九二〇年三月三十日記錄他與阿赫瑪托娃邂逅的情景，其時後者正與亞歷山大·勃洛克在散步。「我這是第一次看見勃洛克與阿赫瑪托娃在一起。勃洛克木無表情，阿赫瑪托娃也是。他們不看着對方，也不相互微笑，但仍然滔滔不絕地傾談。」

就在希列伊科住院時，阿赫瑪托娃朝獨立邁出了一小步。她於一九二〇年五或六月開始到農藝學院的圖書館工作，政府撥給她一所房子後，她就搬了進去。她眼下有一筆微薄的新水，另外，農藝學院還向她提供食務配給卡和木柴。希列伊科出院後，據盧克尼茨基記載，他可憐巴巴地問阿赫瑪托娃，就在自己又窮又病之際，她是否會拋棄他。她立即回答：「不，親愛的沃洛佳，我不會離開你……請搬到我這兒來吧。」

他搬來了，雖然不無異議。搬家的結果造成權力中心的轉移。阿赫瑪托娃眼下成了家庭的頂樑柱，他們住的房子與其說是他的，不如說是她的。一九二〇年八月，希列伊科的薪水僅夠一個星期買一兩天的食品。他病得將衰弱不堪，而兩人的感情關係開始令她窒息。的確，阿赫瑪托娃不會有一首詩註明寫於一九二〇年，這一年她得工作和住在學院裡。這兒的工作要付出大量的精力。對於身穿大衣端坐着的人來說，寒冷是這樣的難以抵擋，有時得

喝一些在爐子上加熱的可可。阿赫瑪托娃的熱飲通常都由別人準備好。她仍在病中，但在客人面前不會現出沮喪的神色。

到一九二〇年，彼得格勒不再是帝國的首都了，正如阿赫瑪托娃所說的，這個城市被完全忽視了：彼得堡所有的一流招牌還在老地方，但招牌後除了灰塵、黑暗和大張着口的空虛外，已一無所有……在戈斯金諾的院子可以採得一大把野花。彼得堡著名的木頭馬路已朽爛，克拉夫達地下室窗子卻飄來陣陣巧克力的芳香……皇村的所有柵欄都燒光了。

一九二〇年，科爾內伊·楚科夫斯基走訪阿赫瑪托娃和希列伊科，他注意到他們所住的房子又黑又濕。此地是這樣的寒冷，以至在他走訪之前，他不得不穿上兩件外衣和一件特大的外套。希列伊科的肺病因胸膜炎而更趨複雜。令楚科夫斯基驚訝的是，儘管阿赫瑪托娃的言談有點粗暴，但她對希列伊科還是挺溫柔，有時「從他的臉拂開頭髮」。據盧克尼茨基回憶，阿爾圖爾·盧里埃在一九二〇年五或六月決定，應該讓阿赫瑪托娃從希列伊科那兒搬出來，安排護士照料重新住進醫院的後者。然而，她不會立刻離開。這是一種真正的病態感應。

阿赫瑪托娃和希列伊科仍然過得很糟糕。一九二〇年八月十二日，有人在蘇捷伊金娜家裡看到阿赫瑪托娃，把她形容為「可怕的骷髏，穿得破破爛爛。」整個俄國，城市的居民如果還有氣力到郊外的話，都跑去交換食品。茨維塔耶娃在她的日記《塵世的跡象》中，記載着她怎樣跑到郊外用首飾交換麵粉。阿赫瑪托娃的身體可經不起這樣的折騰。

即使貴為彼得格勒詩人協會主席，古米廖夫在這些悲慘的日子裡仍找不到足夠的食物去維持身體的熱度，直到搬進中央供暖的藝術之家為止。他身後照舊尾隨着年輕而漂亮的情婦。一九二〇年，詩人弗拉季斯拉夫·霍達謝維奇記得，古米廖夫挽着身穿領口開得很低的黑連衣裙的伊琳娜·奧多耶夫采娃來到一幢房子，這幢房子燈光微弱，因火悶燒着而煙氣嗆人。他凍得瑟瑟發抖，但仍趾高氣昂：「他在大廳翩翩起舞。他整個模樣兒在說，啥事也沒發生。革命？我沒聽說。」城裡找不到牛奶餵他

的小女兒連娜，他只好把妻小送到鄉下母親那兒。然而妻子反對，堅持要把孩子帶回彼得格勒。孩子放到孤兒院，在那兒——就像茨維塔耶娃的小女兒——死於飢餓。

一九二一年二月三日，阿赫瑪托娃從農藝學院調到世界文學出版社，其時古米廖夫也在那兒工作。她的健康情況有所改善，心情愉快，看去年輕了很多，體重略有增加。她對在那兒遇到的楚科夫斯基說：「今天稍晚請到我家來，我送您一瓶牛奶——給您女兒喝的。」楚科夫斯基對此的反應是：「在一九二一年二月，誰也不會送人一瓶牛奶。」三月十四日，就在前往詩人協會領會員卡的時候，阿赫瑪托娃見到了她的前夫。她在房間外候見古米廖夫，他正忙於別的事。不久，辦公室的門打開了，她看見他和亞歷山大·勃洛克在談話。後來古米廖夫迎向她，為讓她久候而道歉時，阿赫瑪托娃矜持地說：「沒什麼，我已經習慣了。」古米廖夫問：「等我嗎？」阿赫瑪托娃回答：「不，排隊。」他在卡片上簽上名，但在分手時只冷冷地吻了一下她的手。

由於生病掏空了身體和不斷的自我鬥爭，阿赫瑪托娃的舉止顯得很高傲。譬如，一九二一年在作家之家，一位熟人這樣描繪她在朗誦詩歌：「站得筆直，很傲氣，肩膀上披一件皮毛。」表面上似乎是傲氣，實際上更接近因悲苦而造成的內心疏遠，她在一九二一年五月致茨維塔耶娃一封罕見的信裡這樣寫到，「喪失書寫能力不會這樣久地令我發愁，我像今天那樣受罪已有多年。您誠懇的態度對於我是無比的珍貴。為此我得謝謝您，謝謝您題獻的詩。」至六月一日前我都在彼得堡。希望能讀到您的新作。」

直到一九二一年上半年，阿赫瑪托娃在所寫的詩裡都拒絕用狂暴的念頭去結束自己的不幸：譬如縱身跳到栗色馬的蹄子下，抑或給缺席的愛人送上一條有毒的毛巾。阿赫瑪托娃的詩到現在仍帶着坦率的肉慾的印記，就像一九二一年八月她所寫的：

我在濕漉漉的情慾中，
重又吻着肩膀。

（三）《阿赫瑪托娃傳》第六章



董樂山

憶董樂山

——《香港日記》之一

陳為熙遺作 奚瑞森譯

編者按：陳為熙先生（一九二八—二〇〇八）曾任《大公報》英文版主編，生前用英文寫下大量日記，本報特請奚瑞森先生譯為中文，以饗讀者。因篇幅關係係者曾略作刪節。

（編者按：本則日記寫於一九九九年）認識董樂山，我在北京的一位好朋友，有三十五年了。聽說他在今年早些時候去世，自然深感震驚，他畢竟才七十四歲。我首先想起的是這位我每到北京必去探望的朋友，最後一次見到是去年十月在他家裡。他看上去狀態不好，坐在一張靠背椅上，告訴我，他在醫院住了四個月，進行放療，剛回來。他一次也沒有提到使他一向具有的開朗性格消失的那個絕症的名字。他說，突變是在他的內臟的兩個器官組織中發現的。影響他的肝的部分已得到遏制，不過，他不能肯定的是向靠近心臟的動脈擴散是否能止住。我告別時心情沉重，但終於見了面還是高興的。

我是一九六四年通過我的妻子美認識董樂山的。當時他們都在北京新成立的第二外國語學院教英文。在一九五八年夏反右運動以後，美和董都被降到某種職民的地位，不再適合留在原單位工作。在失意前董樂山是一位水平甚高的譯者和編輯，在官方的新華通訊社《參考消息》編輯部工作。《參考消息》是一種每日發行的內部刊物，材料選自西方各大報紙和通訊社，由新華社編輯。《參考消息》是通向外界的唯一窗口，只有中央政府和省政府的領導以及中國共產黨的各組織可以看到。

在反右運動期間，我和美都在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對外部——北京廣播電台的英語部工作。美擔任音樂編輯，我先擔任新聞審讀，成績平平，然後擔任文字撰稿人。美剛從廣州的中山大學畢業。我在加拿大上了四年大學之後，於一九五三年參加北京廣播電台。大斧頭落下來的时候，美和我正打算結婚。

中國知識分子從這突如其來的打擊得到的教訓是三緘其口，不過他們不久就懂得，甚至緘默也不保險。隨着激烈的階級鬥爭一輪接一輪，許多人除了接受這樣一個難以相信的事實以外別無選擇。

不用說，愚蠢的政治運動帶來的經濟損失是無法計算的。不過，不那麼明顯但卻更為嚴重的是人的精神損失：從諸如人的尊嚴，對他人的尊重和是非感這樣的不可量化的價值的角度來考量。

實際上，年輕的一代已經開始感到無情的政治運動帶來的痛苦。在五十年代中期已經越來越強調階級鬥爭，許多人僅僅是因為他們的家庭出身「不好」就被剝奪了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當然，終極是文化大革命開始時到來的，那時大中小學一律停課，中小學教師和大學教授被大災難的先鋒紅衛兵當作罪犯看待。數百萬紅衛兵在首都被偉大舵手毛隆重接見後，這些半軍事部隊般的叛亂青年就受到鼓勵在全國鬧革命和大肆破壞，免費乘火車，吃飯也不要錢。但是偉大舵手不久就改變了主意，他發出「最新指示」說，所有學生應該到農村去扎根，「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這道「最新指示」只不過是他老人家忽發奇想的事例之一，但卻對整個一代人具有永久的影響。

時代使他們感到幻滅，幾年後他們獲准回城。數以百萬計的昔日反叛青年後來懊悔不迭，悔不該青春年華虛擲，失去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誠然亡羊補牢之感確實驅使許多人為泄憤而回到課本上去，而且也確有許多人當真奇跡般地進了大學，可是也有多得不可計數的人為環境所逼，隨便找個工作就湊合着過了。

應該說，由於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倡導了為上世紀五、六、七十年代蒙受了冤、假、錯案的無辜中國人平反的事業，人們應該銘記他的恩德。胡的不可磨滅的貢獻為一九七九年底出現的改革時代有效地鋪平了道路。

在北京廣播電台，在反右運動中美成了受批評和不公正對待的對象，倒不是由於她說得太多。事實是，在運動初期，當全體工作人員被鼓勵有什麼說什麼「來幫助黨改正缺點」時，美幾乎一聲沒吭。所有人都得到保證說不會有報復。可是毛突然改變了主意，鎮壓就開始了。

美的命運是預定的結論，因為她拒絕同大家一道指摘我並拒絕把「共產黨、社會主義和人民的敵人」這樣的污水扣在右派頭上。使得事情更壞的是她不但拒絕與我劃清界限，還打算與我這個可恥的右派結婚。美的故事講到這裡已經說明她沒有絲毫可能再留在對國家安全頭等重要北京廣播電台。美從來沒有後悔過。當我在荒涼不毛的渤海岸邊服那沒有盡頭的苦役時，她終於在一九六一年離開了北京廣播電台。

一九六一年晚些時候，我奉召到北京去辦搞右派「帽子」的事情，並在新成立的中國中央電視台 CCTV 分配了一個新工作——當翻譯（屬於「監督勞動」，雖然直到好幾年以後我才知道對我的這種嚴格對待），我在 CCTV 一直工作到一九七九年夏天，我們全家，包括我們的兩個女兒，來了香港。

作為文化大革命中同一「牛棚」、後來又是五七幹校的「難友」，董和美彼此漸漸相當了解了。

到一九七二年時，把可以說是數以百萬計的幹部送到農村去，並使無數家庭撕裂的主張日益淡薄了。由於佔用了大片良田，農民對這種浪費的做法感到不滿。此外，對人力的消耗也嚴重地妨礙了快要停擺的政府工作。

曾被大肆吹捧過的「幹校」無聲無息地解散了，灰心喪氣的幹部們又成群結隊地回城了。許多人來自我國的邊遠地區。回城的人之中包括像董、美和我這樣的「問題人物」。雖然對我們的指控絕沒有取消，與家庭團圓的前景卻使我們大為寬慰。

回到北京以後我們又有可能時常到我們家或他們家見面了。由於那個年月一般中國人家裡沒有電話，通常在晚上或周日下午進行的這種串門總有點意外驚喜的味道，因為沒法事先通告對方你要駕到。

與我們家一樣，董的家也基本上是十五平方米左右的一個單居。在他家裡，所有三張床都靠牆放。第三張床是他的十幾歲的兒子董一波睡的。在唯一的窗子前面放了一張桌子，既是餐桌，又是寫字桌。在我家裡，我有一張雙人床，是美和她的女兒用的。我睡一張白天摺起來的摺疊床。

（上）